

苏轼

研究论稿

王文龙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文龙
著

苏轼研究论稿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苏轼研究论稿 / 王文龙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305-06858-4

I. ①苏… II. ①王… III. ①苏轼 (1036~1101) — 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4058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苏轼研究论稿
著 者 王文龙
责任编辑 刘红梅 编辑热线 025-83686531

照 排 盐阜大众报业集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21千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06858-4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件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 (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从 1982 年撰写第一篇专题论文起步,屈指算来,我与“苏学”相伴,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倘要问起这许多年来的独得之秘,我却颇觉茫然。因为我面对的是人所共感的“苏海”,它虽历近千年,却依然是那样苍茫、深邃,无有端涯,非寻常人所可蠡测。我想,我仅是由于天赐机缘,随着一大段生命的进程,走进“苏海”时,留下了一串或浅或深的足迹而已。这部结集成册的《苏轼研究论稿》,便是一个见证。

一

循名责实,理有固然。本书定名为《苏轼研究论稿》,是因为全书都是围绕着对中国古代文学巨匠和文化巨人苏轼及其作品、文论等的研究而展开的(个别文章是对有关论著的再研究)。全书共收入论文 30 篇,绝大部分曾先后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与高校学报上发表(个别选自拙著《东坡诗话全编笺评》),其中有向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学术年会提供的论文 12 篇,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2 篇,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的 4 篇,学术界有关述评所涉及的论文 12 篇(参见《附录》)。全书总计 32 万余字(包括《前言》、《后记》)。

本书主要是企图就苏东坡的文学作品(包括诗、词和散文)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两个方面作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也有少量例外,权当另辟蹊径。依照研究对象的不同类型,全稿分为四个部分。兹略述于后。

(一)诗论与诗学心裁

共 8 篇。其中有 3 篇专论苏轼诗。《试论苏诗的哲理性》是结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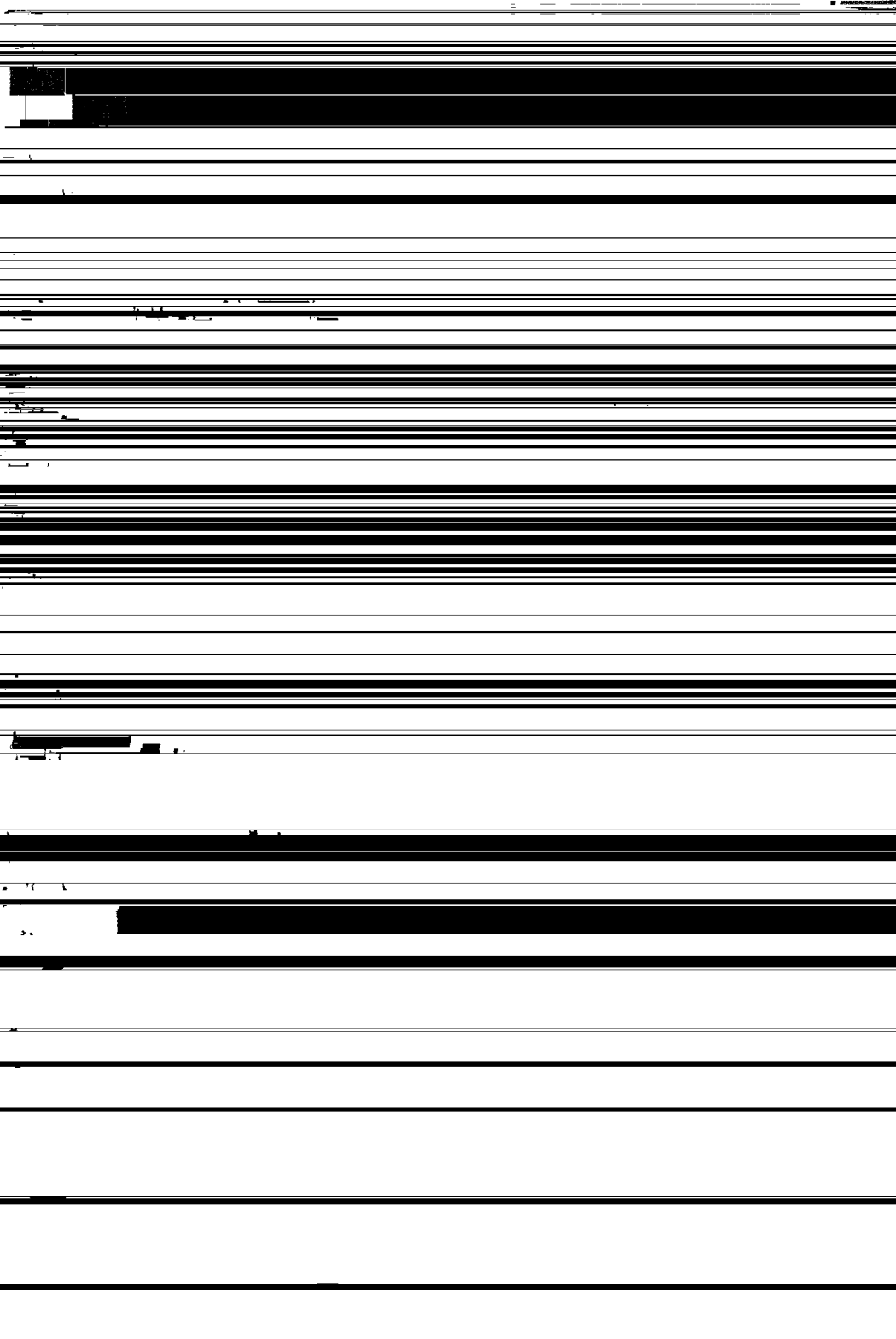
“苏学”的发轫之作,较早地接触到苏诗艺术论中的一个难题,或以论述的较新颖、独到而入选由学会早期编定的《东坡研究论丛》。《诗家“雏凤”姿》和《苏诗师杜散论》也是从较少为人注意的角度立说的,前者作为诗坛名家处女作“个案”,意在展示苏诗初期思想和艺术的面貌;后者则从继承传统着眼,重在揭示苏诗师法杜甫的种种表现。相对说来,我对东坡诗学的探索和梳理用力更多,也较深入与系统化。内容包括诗歌美学(《东坡诗歌美学探幽》)、诗歌创作论(《东坡诗歌创作论概观》)、诗歌鉴赏论(《试论苏轼关于诗歌鉴赏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诗话(《〈东坡诗话全编笺评〉前言》)等。其中关于鉴赏论一篇,或以富有理论色彩的重建引人注目,而为《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所刊载。此外,鉴于《乌台诗案》是一部“变形”的诗话,我便从政治、文学、法律等诸多角度作了透视,借以引出历史的教训(《乌台诗案纵横谈》)。

(二)词论

共9篇。无一例外地是对东坡词的论述,而立说的角度与侧面各有不同。这里有对东坡词一个时期创作的评述(《东坡前期杭州词平议》),有对东坡词艺术特色的品评(《论东坡词的心境传写》、《论苏词的超逸》),有对古人认定的某种作法的阐释与推演(《也谈“以诗为词”》、《论苏轼的以学问为词》),还有对于诸如思乡词、爱情词、“官妓为导”现象、伤春惜花之词等的解读(《东坡词阅读札记》)。另有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词人的人生态度(《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从音乐学的角度探索东坡的自度曲(《东坡词自度曲考述》),或能别开生面。

(三)文论

共7篇。这里涉及对苏东坡三类散文作品艺术特点与成就的研讨:一类是普通的文学散文,就其“妙造自然”、“溢为奇怪”、创造意境等特点作了分析与评价(《东坡散文艺术探微》);一类是篇制短小而抒写自由的小品文,从题材、作法、风格等方面展开了论述(《从〈志林〉看东坡小品文的文学成就》);一类是旧属韵文而今可归入文学散文的赋体作品,对其诸多艺术特色作了论列与评介



原因有两点：一是得之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涵盖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根基极其深厚。即如诗文，宋人生当唐人之后，固然盛极难继，开辟难为，然而文化上特别是其中文学上的积累又远胜于唐，可以博采诸家，兼擅众美。二是东坡其人极富才华与创造力。每当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他在那个空前广阔的自由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总是运斤成风而又游刃有余，因而每臻极致。

所以本书中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尽管林林总总，有“点”有“面”，由一个方面拓展到多个方面，而从根本上说来，还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系统研究。但我们总不能一味望洋兴叹，无所作为，忘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古训。况且汇聚众人的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或可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之效。正因为如此，凭着兴之所至，或目光所及，选取若干课题，然后各个击破，便成了我基本的研究策略。附带说一下，与超一流的研究对象相比，我辈简直是“渺沧海之一粟”，彼且有“高大以临我”之势，何谈与之逼近？但作为能动的研究主体，我辈在精神上何尝不可有以我临物的超越？倘如此，则以小观大，高屋建瓴，皆无不可。而且唯有如此，我辈方能摆脱被动式与逼迫感，从而进入良好的状态，论苏方能展开，方能深入。不知同道诸公以为然否？——我有如此悟性，还要感谢东坡饱含哲理的妙文给我的启示（参见《超然台记》）。

我深知创新是学术生命之所系，因而总是把创新当作自己不懈的追求。坦率地说，我向来不屑于陈陈相因，人云亦云（但不排除因处于“人自为战”的封闭状态，而与同道或有暗合的偶然性），倘若提不出一己的见解，决不轻易动笔。学者的新见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论是对苏轼文学作品的研究，还是对苏轼文论与批评的探讨，我都很注重对文本的研读与感悟。我以为从研读开始，随时记下自己的心得，所见最为分明，最为可靠，也最容易有新的发现。非如此恐难做到深造有得，而非深造有得便下笔千言，大概要与学术创新南辕而北辙了。我这样说，并非排斥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恰恰相反，对于有关研究资料，我总是尽可能地占有。然而或许与人不同的是，第一，我不是先阅读资料，再独立研究，因为这可能

导致先入为主,削弱乃至丧失自我(即主体性);第二,主从关系不能变。他人的成果诚然值得重视,但一经为我所用,则未尝不是处于服从的地位。借用古人的话来说,便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偶有例外)。学者的学术创新,与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也至关重要,决不是走捷径,赶潮流。我在研究中,很注意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使研究方法多元化,往往因此而带来全新的发现。我从单一化的文学研究,到美学研究的渗透,再到文化学研究的尝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自己就觉得颇多创获。当然,学术研究务必求真。作为研究者,虽说可以见仁见智,总以求得真知为贵。所以将创新与求真统一起来,才是做学问的正道。

确立研究重点,倾全力而为之,是突破难关,提高学术质量行之有效的方法。没有疑义,对于研究主体来说,自身学养的提高是第一位的,中古时期大文论家刘勰所谓“根之深者其实繁,膏之沃者其光晔”,至今仍未失去其真理性。因而,在学术上急于事功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不过,在遭遇学术难题的关口,全力以赴,重点突破,还是可行的,并且是可操胜券的。一度时期,我先以东坡散文美学为突破口,初战告捷之后,又一鼓作气,以东坡诗学为切入点,致力于古今文论的沟通与对话。这在学界尚未完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今天,其步履维艰可以想见。而我以当代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连同蕴含其中的哲学精神)为基点,以中国古代文学史及批评史为坐标(无此二坐标,则是画地为牢),观照东坡诗学,积数年之功,居然找到了豁然贯通的感觉。因为在此期间,我有幸写出了这方面的系列论文(见前),其中的鉴赏论专篇还得到了国家学术刊物的认可。倘作乐观的估计,或许可以说,我是在漫长的崎岖山路上初步打出了一段通道吧?

本书中多半是文学论文,因而与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作为文学论文,它们不应当只是枯燥无味的叙说,而应当伴随着生动、形象的感性材料;不应当是纯粹的逻辑推导,而应当不失文学趣味;不应当是极冷静、纯客观的“零度风格”,而应当有作者适度的情感介入。这并非出于偏爱,或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前辈大师和

当代学人的优秀文学论文都足以为我们垂范。本人私心有慕于此，因而在写作实践中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说对于文学论文还有某种审美追求的话，那么我想补充以下三点：一是平生作文，颇心仪于郑板桥的“沉着痛快”之说，故于达意，往往务求酣畅而后已。然亦无取瘠义肥辞，不肯放纵笔墨。二是古人作剧，讲求“凤头、猪肚、豹尾”（乔吉语），我以为这六字不妨移用作文学论文结构上的总体要求。本书中的代表作或能仿佛一二，至于其余，就只能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了。三是在语言方面，我追慕的境界是华实并茂。所谓“华”，就是要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所谓“实”，就是要切实有力的表述。本书中的文章或能部分地体现这样的追求。

发扬古人“论道当严”的精神，力求评价的客观、公允，这是维护学术尊严的必备要求。我虽深爱东坡，东坡的文学造诣与成就虽极高，但金无足赤，我决不护其短。本书中许多篇章自有褒贬，甚至近于锱铢必较，以减少毫厘千里之失，——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究竟，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三

我们心自问，将历年的论文整理付梓，用意何在？小而言之，恐怕无异于敝帚自珍。无论如何，那些论文是个人多年心血的结晶，不忍心任其随风飘散，湮没无闻，而应当为它们寻个较好的归宿。大而言之，或许可以与时贤们形成一种合力，来推进或可称为“显学”而又方兴未艾的苏轼研究，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事业。只是心期如此，就未免不自量力了。

现在就选文、增删、格式、附录诸项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一是选文。本书中选文差不多囊括了个人多年来关于苏轼研究文章的全部。其中 20 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前期的部分文章，参照当时权威性的学术资料（如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以及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如东坡词创作始于判杭说），不免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失误（尤其是所涉少数作品的编年问题）。但文章本身

尚有一些新意,所以未能割爱。由于种种原因,不同文章之间偶有内容交叉以至重复的现象,而唯恐牵一发而动全身,故亦未便删削。所有文章篇后均注明出处,即原载刊物及发表时间,转载及复印情况一并阑入,与“苏学”年会相关者亦特予点明,意在多留下一点岁月的痕迹,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个别文章后还加了“作者附记”,对有关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以与读者坦诚相见。

二是增删。入选文章并非原封不动,除订正原有的刊误外,还作了少量的删改与增补。如原作或因当初版面的限制,有所删节(包括引文出处),而于文意实有所损害(或有损学术文章的规范化),此次入集,自然要恢复原貌;或因发现新材料,对原作有所补充;或因注文繁琐而适当删削,等等。好在此中并无争鸣文字,就不致有对他人是否公平的顾虑了。不过,总的说来,还是基本上保存了文章的本来面目。

三是格式。不同时期的论文格式也不尽一致。为使其大体统一,对近十年流行的正文前列出的“内容摘要”、“关键词”等项均予以删除。唯注文或在文后,或在文中,或两者兼用,或文中用夹注,篇后列出“参考文献”,诸如此类,鉴于百刊统一的格式尚未形成,姑一仍其旧。岁月不居,读者亦可借觐历史原貌。而为求排版方便,原页下注均改为篇后注,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四是附录。正文之外增一“附录”——“学界的有关评述”,我不知道是否有蛇足之嫌。其实它仅限于作者所接触到的范围之内(未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形诸文字,为公众所见的东西。我的初衷并非借他人(包括名家)以自重,而只是提供一些参考信息,或许可以见证经过学者深入思考的文章,可能不会被世界完全遗忘。这也可以使我从逝去的岁月中多找回一点自信。收录的材料一律按照所涉及的文章在本书中的顺序加以编排。对于其中个别失误,我已加了按语(即“龙按”云云),说明原委,以免误导读者。

至于这本书之所以称为“论稿”,不仅因为其中一部分文章是一二十年前的旧作,可能已经落后于苏学研究的实际,而且有个别文章,受制于当时的研究水平,现在看来,更有着较明显的局限。即

使是个人的代表作，如《试论苏轼关于诗歌鉴赏的理论与实践》、《东坡散文艺术探微》、《论苏轼的散文美学思想》、《论苏轼的以学问为词》等，其所述充其量也仅是一家之言，还要在今后学术研究过程中经受检验。恳请专家、同道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长期从事“苏学”研究，一如梯山航海，固时兴履险涉艰之叹，而亦乐在其中：在阅读中与苏东坡分享创造的快乐，在欣赏中感受审美的愉悦，在领悟中体验会通的惬意，在写作中品尝创新的甘美。的确，在个人苏轼研究的历程中，上述两方面的体验都颇为深切。它们将与苏东坡光照千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当我回首往事，交出这份粗浅的学术总结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校内外的诸多师友，尤其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内的师友们，他们的奖掖、勉励以至提携和鞭策，曾使我平添学术上的勇气；他们的种种精心结撰，则是我学习的范本。更何况多少回出席“苏学”盛会，与师友们朝夕相处，切磋交流，获益良多。没有他们，我以个人的绵薄之力，未必能与“苏学”相伴到今天。恕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我会永远铭感于心，并在心底为他们祝福。此刻，在祖国的大西南，新一届学会的大纛正在学术的天空招展，当此河清海晏、文化昌明的时代，我祝愿业已国际化了的“苏学”的明天更加光辉灿烂！

作者

戊子孟夏于盐城师范学院东麓斋

（载《苏轼研究》2008年第3期）

目 录

前言	(1)
----------	-----

诗论与诗学心裁

试论苏诗的哲理性	(1)
诗家“雏凤”姿	
——苏轼早年前期“南行”诗漫评	(13)
苏诗师杜散论	(26)
东坡诗歌美学探幽	(42)
东坡诗歌创作论概观	(60)
试论苏轼关于诗歌鉴赏的理论与实践	(76)
《东坡诗话全编笺评》前言	(92)
乌台诗案纵横谈	(101)

词论

一位天才词人的试笔	
——东坡前期杭州词平议	(115)
“寄慨无端,别有天地”	
——论东坡词的心境传写	(125)
“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	
——论苏轼的超逸	(143)
也谈“以诗为词”	(157)
论苏轼的以学问为词	(169)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东坡词阅读札记	(180)
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	(210)

东坡词自度曲考述	(214)
----------------	-------

文论

东坡散文艺术探微	(221)
从《志林》看东坡小品文的文学成就	(238)
东坡赋的艺术特色	(251)
苏赋二题	(260)
论苏轼的散文美学思想	(271)
三苏散文美学研究札记	(284)
论东坡尺牍的文献价值	(292)
苏文辨正举隅	(304)

其他

东坡论“诗学”传统	(311)
东坡论陶述评	(320)
太白漫议	
——东坡诗话辑评之一	(331)
说东坡论杜	(339)
苏轼论门下“四学士”	
——东坡诗话辑评之二	(350)
一部融汇学术研究与地方文化的力作	
——评《苏轼在密州》	(359)
宏通与邃密	
——读张志烈《苏轼作品中的音乐世界》	(363)
附录 学界的有关评述	(368)
后记	(372)

试论苏诗的哲理性

我们读苏轼的诗,如同登上高山纵览云海,但见气象万千,舒卷自如,忽而又风起云飞,变幻莫测,能得到清新雄放而又深微窈冥的艺术感受。这同苏诗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变化多端的篇章结构固然有关,但同苏诗在豪迈奔放的格调中时而渗透着深刻的哲理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较深入的探索,那么对于认识苏诗的全貌,认识作为当日诗坛盟主的苏轼对宋诗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以至对于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或许会有所裨益。

一

以议论入诗,这在开一代诗风的苏轼诗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其后宋人效尤,实在不足为奇。而要通篇以议论为诗,又能凝成一种哲理,苏轼就是颇擅胜场的了。试以他那首人所共知的《琴诗》为例,美妙的琴声本是琴师抚琴所发出来的,是与心相应的指头同琴弦密切配合的产物,空弦不成声,空指亦难鸣。正是基于这样的构思,诗人写下了这首诗。首句“若言琴上有琴声”,妙在似是而不完全是,第三句“若言声在指头上”,妙在似非而不完全非。诗中两问各执一端,提出两难,尤为发人深省。显然,这“琴”是发出琴声的内因,用“指头”弹拨则是外因,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其实,何止是琴声,世间任何事物的产生概莫能外。这首诗原来道出了这样一个深奥的哲学道理。

《琴诗》虽然形象不够鲜明、饱满,却不失诗的趣味。不过,在东坡诗集中,这种通篇议论的哲理诗并不多见。我们知道,苏轼喜欢以才学为诗,有时让一堆死的典故窒息了诗的生命,造成了所谓

“事障”。但他这类哲理诗一般都没有“理障”的毛病,这不仅因为他能以才情驱遣笔墨,把诗句写得动荡流走,不落平板,而且因为它们不是直接的说教或肤浅的议论,而是在明白如话而又充满意趣的诗句中包孕着深刻的哲理,或者用郭绍虞先生的话来说,叫做“说得活”(《沧浪诗话校释·诗辨释》)。

毫无疑义,作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这似乎同用逻辑思维来表达哲理常常是格格不入的,但实际上形象与哲理并不是绝对排斥,不可统一的。苏轼的一些哲理诗就能把形象描绘和富于哲理性的概括很好地结合起来,诗中既然有了形象的血肉,哲理的精魂便有所附丽。带有寓言性质的《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就是这样:雷电被人们奉若神明,那轰然震响的雷声使人间多少人为之“失箸”!然而在那个“已外浮名更外身”,身居高耸入云的天目山的道人看来,这只不过像婴儿的啼叫声一样,委实“区区”不足道!对于达到了忘我境界的人来说,任何外界的强力都不在话下;这正是诗人所要表述的哲理。

著名的七绝《题西林壁》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概括了游庐山总的印象和感受。前两句是对庐山山景的粗笔勾勒,是诗人眼中所看到的和心中所感到的山景。“横”、“侧”、“远近高低”等字眼,标明了观察角度的变换,“成岭”、“成峰”以至于“各不同”,则融进了主观感受。后两句以感叹出之,亦情亦理,既惊叹于庐山的壮丽多姿,胜景难穷,又揭示了一个生活的哲理:局中人囿于见闻,往往不容易看到事物的真相。人们常说的“当局者迷”,不正是指的这一习见的生活现象吗?这两句丰富的内涵还不止于此。它还启示我们,如果只孤立地体察(或接触)事物的一些局部,而不能从这一事物的圈子里跳出来,那是不可能真正认识事物的全貌的。世人所熟知的“瞎子摸象”的传说,与这首诗的题旨很有些相似之处。苏轼在《日喻》一文中所叙述的盲人识日的故事,亦庶几近之,而他在该文中所阐述的“故世人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皆求道之过也”的哲理,就更与本诗的作意相通了。

《题西林壁》之所以成为哲理诗的名篇,同它的写作手法上的

独到之处也是分不开的。作者先用两句景语张本,或者说,像潜藏着鱼龙的水波一样,让这两句暗伏着“理”。而后,用两句理语揭示底蕴,让水中的“鱼龙”腾跃而出。全诗就是这样把形象描绘与哲理熔铸结合起来(就中又以“理”为主,使景和理融为一体),这便是这首哲理诗的妙处。

再如那首《和子由澠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请看,诗人简直是满怀深情地在探索人生奥秘这一富有哲理性的课题!首句劈头提出一个人生哲理问题,引出前半首诗。接下去用了雪泥鸿爪这样一个贴切、生动而又新颖、奇警的比喻,来概括人生历程。其中自然有对人生短暂的怅惘以及萍踪不定的慨叹,但更有对人生长途庄严而深沉的思索。第三联将死者形迹的消亡与生者踪迹的消失相对照,以表明雪泥上飞鸿“指爪”的“偶然”存在和终归泯灭。还有一类雪泥鸿爪,那是保存在活着的人们记忆中的:“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尾联仿佛是在突出“往日”的一个“镜头”,再现了泥上偶然留下的“指爪”,而它在时间和空间中事实上的消失,已不待言了。总之,诗的后半首诗人以他兄弟俩与澠池有关的一段经历和见闻来印证和深化前半首所表达的人生哲理,同时又着重表现了一腔热烈的怀旧之情,做到事理并茂,情景交融。这是一首感人的抒情诗,也是一首隽永的哲理诗!

二

把形象、感情、哲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应当说是哲理诗中的上品。苏轼的能事却不止于此。试看他的《石鼻城》:

平时战国今无在,陌上征夫自不闲。北客初来试新险,蜀人从此送残山。独穿暗月朦胧里,愁渡奔河苍茫间。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

粗粗地看起来,这是一首写景诗,是纪游之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我们玩味再三之后,兴许就会发现:诗人对石鼻城的山水,一不写其壮,二不写其秀,而着重写它的“奇”与“多变”。这是南来北往的分野,崎岖山路与一马平川判然而分,因而有人迎接“新险”,有人送别“残山”。人们时而“独穿暗月”,时而“愁渡奔河”,是那样凄迷、索寞,可是一旦“渐入西南”,风景顿时改观,又使人精神一振:“道旁修竹水潺潺。”诗人所描写的固然是石鼻城的山川风物,却又不尽然,它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颇富理趣的境界,这儿有险与夷的交替,有忧与乐的相形,有朦胧与明朗的变幻,有水月迷漫与别有洞天的转换。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社会的、人生的以及治学、立业等方面的某些境况和情味。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倒是可以把这首诗当作半篇《游褒禅山记》来读的。

是的,苏轼这一些富于哲理性的诗写得比较含蓄蕴藉,哲理的锋芒含而不露,只是寓哲理于诗的意境之中。然而我们仔细玩索,自能体味到其中哲理的甘美。这真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呢。

写景之外,还有咏物。让我们看诗人笔下的《鱼》:

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

湖面上一群群鱼苗在互相追逐嬉戏,它们“初生不畏人”,无拘无束,憨态可掬。这正表现了它们的活泼可爱,也显示了他们的幼稚和真淳。但是当它们长大一些之后,严峻的现实很快使它们惊醒:它们不再在湖边喋喋藻荇,公开露面,而是远走深藏,变得历练老成起来了。然而它们从此也失去了天真可爱的本来面目。这首诗是苏轼早年在凤翔府作判官时写的,显然融进了自身的一些社会经验,写出了对于人生的体味。《邵氏闻见后录》中就有关于他同知府陈希亮之间一度关系紧张的颇有戏剧性的记载。我们虽不敢断言,《鱼》这首诗确实与邵氏(博)所记有联系,但可以肯定,年青的苏轼是有过这一类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经历的。难道我们从诗中鱼儿畏避的“钩饵”,不能联想到人世间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罗网吗?再看他的即事诗《六和寺冲师阄山溪为水轩》: